

试析中美建交后美国对台军售*

——结构性矛盾和政党影响

漆海霞 徐进◎

【内容提要】 中美建交后，美国始终坚持对台军售。为了探究其原因，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从国际层面看，有中美关系、中国崛起等角度，从国内层面看，则有政党派别和府会结构等视角。为了判断哪些因素起关键作用，笔者搜集了有关数据并进行了统计分析。根据回归模型，笔者发现：首先，美国对台军售的根源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其次，美国对台军售受到美国国内党派政治的约束；最后，改善中美关系难以减少美国对台军售。因此，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可能是未来长期困扰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隐忧。

【关键词】 售台武器 结构性矛盾 政党因素 中美关系

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第一年就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然而，就在国内普遍对奥巴马任内的中美关系持乐观态度时，仅仅两个月后，美国于2010年1月宣布向台湾地区出售总值11亿美元的“爱国者”反导系统装备。一时激起中国的强烈反应，除了与美国严正交涉外，中方

*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王雪莲教育基金的资助。

《国际政治科学》2012/1（总第29期），第36—60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还推迟了中美两军部分交往项目，中美关系笼罩在对台军售的阴影之下。

为何在中国的多次强烈反对下，美国仍然一意孤行，执意对台军售？这是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无法绕开的问题。由于台湾问题涉及祖国统一的问题，因此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现实紧迫性。回顾中美建交以来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对台军售历来有之。^① 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美国就对台军售以保护台湾免受大陆攻击。^② 从武器价值来看，过去60年台湾是亚太地区最大、全球第四的美国军售对象。^③ 早在中美进行建交谈判时，美国就要中国接受“美国应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条件。^④ 1979年4月10日，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的《与台湾关系法》中规定：“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要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⑤ 尽管在《八·一七公报》中，美国政府声明，将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该问题经过一段时间将获得最后的解决，^⑥ 然而，美国政府和国会多次强调《与台湾关系法》在法律上优先于《八·一七公报》。^⑦

① 参见 James Mann, *About Face: A 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ress, 1999)。作者对1949—1997年的中美关系历程进行了仔细分析，并发现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甚至会导致中美关系走向对抗。

② Alan M. Wachman, *Why Taiwan? Geostategic Rationales for China's Territorial Integr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 David Lai, "Arms Sales to Taiwan: Enjoy the Business While It Lasts," *Of Interests*,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May 3, 2010.

④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实力与原则》(邱应觉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60页。

⑤ 资中筠、何迪主编《美台关系四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8页。

⑥ 新华社《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美国承诺售台武器首先在性能和数量上不超过建交以来近几年的水平，逐步减少，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人民日报》1982年8月18日，第1版。

⑦ 例如，1994年4月30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国会“国务院授权法”，其中就包括有关《与台湾关系法》优于《八·一七公报》的国会声明。参见肖元恺《百年之结》，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8页。1996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务院对外关系授权法案》，正式把《与台湾关系法》置于《八·一七公报》之上。参见李庆四《美国国会与美国对华政策》，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可见,美国对台军售态度坚决,已成为困扰中美关系的隐忧。从性质上看,对台军售是将台湾当作政治实体对待的标志,有害于我国主权。^①从后果上看,对台军售将加剧台海两岸的“军备竞赛”,可能使两岸冲突难以避免。^②台湾问题将是导致东亚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③

面对如此严重的后果,为何美国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执意屡屡对台军售?为了探究其原因,笔者将就美国对台军售的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

一、关于美国对台军售的文献回顾

对于美国对台军售的影响因素,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观点,大多认为美国对台军售受到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这种综合分析虽然面面俱到,但未免庞杂冗余,难分主次。为了便于把握逻辑脉络,下面笔者将从国际层面和国内层面这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 国际层面的影响因素

具体而言,较多学者认为,从国际层面看,影响美国对台军售的主要因素为中美关系和中国崛起。

1. 中美关系

很多学者认为中美关系决定了美国对台军售。琳恩(Erica Lynn)认为美国在台海局势中扮演着“平衡者”的角色。她建立了一个冲突博弈模型,发现美国可以通过帮助台湾当局增强军力而避免与中国大陆卷入战

^① 张清敏指出“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是美台实质关系的一个核心,是美国将台湾当作政治实体来看待的标志。”参见张清敏《美国对台军售决策的官僚政治因素》,《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1期,第28页。

^② 史文《美中关系好转与台湾问题》,《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第49页。

^③ Thomas Berger, “Set for Stability? Prospects for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3, 2000, pp. 405-428.

争，若美国对台军售，其博弈纳什均衡解为台海之间实现和平。^① 但是这一博弈是静态博弈，琳恩没有考虑大陆的反应，若美国对台军售激起中国大陆的强硬反应，则纳什均衡解可能不再是两岸和平。张清敏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决定了美国的对台军售政策，而对台军售政策则反映了美国对华政策。^② 李江虽然没有具体分析到美国售台武器，但是他指出中美关系的进展状况会影响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台湾问题是否得到妥善处理也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③ 牛军也认为美国对台海政策的调整主要取决于中美关系的状况和美国对台海局势的估计。^④ 高杰进一步分析了中美关系发展到不同程度时，美国对台军售的强度会有何区别。他认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战略决定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又决定了其对台军售的力度，^⑤ 进而总结出两个规律——“中美关系摇摆不定的时期，对台军售总体上较为收敛”^⑥ “中美关系紧张时期较缓和时期军售力度更大”。^⑦

以上观点较多是根据经验和直观判断而得出的结论，而不是根据数据得出的精确结论，可能会出现误判。为提高判断精度，笔者在下文中将进行定量分析。

2. 中国崛起

学者们认为，中国实力的增长使美国感受到威胁，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发展海军的呼声会越来越高，中国民族主义者要求发展海军的

① Erica Lynn, "Analysis of the Dispute over Taiwan Using a Game Theory Approach," *Defense & Security Analysis*, Vol. 21, No. 4, 2005, pp. 413-418.

② 张清敏 《从布什政府对台军售看美台军事关系的变化》，《美国研究》2004年第4期，第36页。

③ 李江 《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2月，第10页。

④ 牛军 《布什政府台海政策透视》，《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第1期，第27页。

⑤ 高杰 《浅析中美关系发展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影响》，外交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5月，第15页。

⑥ 同上，第15页。

⑦ 同上，第15页。

理由之一就是有助于两岸统一。这种舆论压力会对中国决策产生影响,中国海军的发展会打破地区的均势平衡,使美国感受到威胁。^①因此,美国将通过对台军售来遏制中国崛起。^②例如,早在2005年,美日防长和外长会议就将台湾海峡列入了美日同盟的战略目标,声称“假如(北京)不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日美将不会采取视若无睹的态度”。^③2006年,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将中国定位成“美国最大的潜在军事对手”、“站在十字路口上的国家”和需要重点遏制的对象。^④麦德罗斯(Evan S. Medeiros)也指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安全合作背后具有多种动机,然而,其核心动力是创建安全结构以防止或吓阻中国扩大其地区影响力”。^⑤王公龙认为保守派多从战略视角利用台湾遏制中国崛起。^⑥其他学者认为,不仅保守派如此,美国决策者也是如此。例如,高杰指出“一旦美国感到中国对其霸权地位构成挑战,则又会拿起台湾这个棋子,通过对台军售牵扯中国相当一部分精力,进而达到其阻挠中国发展和迅速崛起的目的。”^⑦戚兴元也认为“中国被美国当作在亚太地区实际的‘竞争对手’,美国的亚太战略不能不从制衡中国的角度来规划和执行,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发展和壮大。美国的东亚安全战略报告着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大打‘对台

① Robert S. Ross, “China’s Naval Nationalism: Sources, Prospects, and the U. S. Respon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2, 2009, pp. 46–81.

② 阎学通指出,美国会对台军售以防止中国统一台湾,防范中国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阎学通《中美是“敌大于友”的关系》,《国际先驱导报》2010年3月23日。

③ Larry A. Nicksch, “U. S. Security Politics in the Western Pacific,” <http://www.ndu.edu/inss/symposia/Pacific2005/nicksch.pdf>.

④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http://www.Defense.gov/qdr/report/report20060203.pdf>.

⑤ Evan S. Medeiros,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Pacific Stabil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1, 2005–2006, p. 149.

⑥ 王公龙认为“包括传统保守派、极端保守派和新保守派在内的多数保守派通常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待台湾的价值,相信利用台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中国的崛起,至少可以延缓中国崛起的进程。”王公龙《保守主义与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第116页。

⑦ 高杰《浅析中美关系发展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影响》,第32页。

军售’牌。”^① 有学者认为，随着中美实力的变化，美国会不断升级对台军售。^②

以上分析虽然指出了遏制中国崛起这一因素，但是中美实力对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上述学者并没有分析从何时开始美国对台军售的主要动机变为遏制中国。而且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美国究竟是关注绝对获益还是相对获益，这是关系到美国对华崛起究竟是默许还是遏制的因素，以上学者并没有就此进行深入分析。下文将应用数据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二）国内层面的影响因素

在国内层面的各影响因素中，学者们大都指出政党和府会结构的影响，因此下文将就这两个因素进行阐述。

1. 政党因素

对于政党的影响，大体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党派差异不大，例如，王中文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在对台军售政策上相差不大。但他这一论断只考虑了总统层面，而没有考虑国会层面的党派差别。^③ 邢悦指出，美国国会在对台议案表决中基本有“一致性”的特点：投票结果一致和两党对台政策一致等。^④ 美国学者吴书亚（Su-Ya Wu）也认为目前美国国会在台湾问题上具有一致性，并指出其原因在于美国的道义观，而不是由于美国与台湾的贸易关系。^⑤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两党有较大差异，张光和刁大明虽然没有直接分析

^① 戚兴元 《冷战后影响美国对台军售的主要因素》，中共中央党校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5月，第7页。

^② 徐荣认为“同时中国的崛起也使企图建立单极霸权的美国感受到压力。在此背景下，美国不断升级对台军售，加强与台湾的军事交往与合作，目的是使台湾成为其遏制中国崛起的一张‘王牌’。”徐荣《冷战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5月，第32页。

^③ 王中文《中美建交以来美台军售研究》，苏州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5年4月，第47页。

^④ 陈炯、邢悦《从投票行为看1990年以来美国国会对台决策特点》，《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3期，第41页。

^⑤ Su-Ya Wu, Joshua, "Economics, Lobbying, and U. S. Congressional Support for Taiwan: Buying American Support," *Asian Survey*, Vol. 49, No. 2, 2009, p. 382.

美国对台军售，但是通过分析包括军事内容在内的涉台提案发现，“共和党议员的涉台提案总数远远多于民主党（150件比93件），显示了其更加热衷于介入中国的台湾事务的倾向”。^① 戚兴元则认为两党在时间、数量等方面略有差异，“两党都推行对台军售政策，以加强台湾所谓的‘安全保障’，只不过在军售的时间选择、数量、技术性能上有所差异罢了，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其国家利益”。^② 张清敏和罗斌辉认为共和党在推动对台军售上更为积极，他们指出“共和党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崇尚以实力政治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军事力量为代表的硬实力，更倾向于使用对外军售特殊的外交工具。”^③ 同时他们指出民主党相对克制，“民主党更多强调民主、道义、人权等软实力，在美国对外出售武器问题上，相对克制。……每当这个时候，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就会对行政部门施加压力，敦促行政部门向台湾出售更多的武器”。^④

在不同层面上不同党派的售台武器内容可能存有差异，由于美国的政党差别不仅体现在国会层面，也体现在总统层面，因此笔者将党派差异具体分为总统层面、参议院层面和众议院层面，后文将就此进行详细分析。

2. 府会结构

“国会与总统冲突的来源在于一党占据总统职务而另一党支配整个国会。”^⑤ 谭世坪认为，府会结构是国会干预台湾问题的原因，他指出：“从美国民主政治的特点来看，两党政治制度也造成了冷战后国会以进攻的姿态干预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⑥ 魏军也持这一观点，他说“美国国会之所以在冷战后竭力支持台湾当局与国会议员结构的变化有着密

① 张光、刁大明 《美国国会涉台提案的发展》，《台湾研究集刊》2007年第2期，第23页。

② 戚兴元 《冷战后影响美国对台军售的主要因素》，第26页。

③ 张清敏、罗斌辉 《外交决策模式与美国对台军售政策决定因素分析》，《美国研究》2006年第3期，第39页。

④ 同上，第39页。

⑤ 魏军 《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第19页。

⑥ 谭世坪 《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与美台关系》，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4月，第72页。

切的关系。”^① 张光和刁大明考察了里根政府时期的府会关系，发现府会的党争引起了民主党国会向共和党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发难。^② 可见，学者们大多认为府会结构影响了美国对台军售，但他们并没有解决不同的结构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一问题。

根据以上对文献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首先，学者们大多强调影响美国对台军售的某一方面因素，但是正如张清敏所言“理性行为模式、跨机构模式和官僚政治模式只把握了美国对台湾军售决策的一个方面，没有也不可能把握美国对台军售政策的全貌。”^③ 上述学者均强调各自所重视的原因，而相对忽视其他影响因素，且没有比较不同因素对美国对台军售的影响程度有何区别。其次，大多数研究专注于对影响美国军售的具体原因分析，然而为何有的年度美国军售数额大，而有的年度军售数额小？对于影响军售数额的具体变化的原因，学者们研究较少。因此，为了深入研究，本文将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入手，分析影响美国对台军售额的重要因素，以探究其规律，利于我国找到合适的应对之策。

二、研究假设和变量选择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将研究影响美国对台军售金额的因素，因此，笔者将列出相应的研究假设和变量选择。

（一）研究假设

根据前文，本文设定如下假设：

① 魏军 《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第 19 页。

② 张光和刁大明指出“里根执政的涉台提案开始显示出党争的作用。这期间的府会关系均为‘分立政府’，民主党在 1980—1982 年第 97 届国会期间，控制众议院，在 1983—1988 年期间控制参众两院。在这期间的总共 31 件涉台提案中，民主党贡献了 20 件，将近共和党的两倍，显示出民主党借台湾议题向共和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发难的企图。”参见张光、刁大明《美国国会涉台提案的发展》，第 26 页。

③ 张清敏、罗斌辉《外交决策模式与美国对台军售政策决定因素分析》，第 48 页。

1.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对台军售受到国际格局的影响。冷战时期的军售较少,冷战后军售较多。

2.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对台军售受到中国崛起的影响。在中美实力差距较大、美国感受不到中国威胁时,军售较少。当中美实力差距较小、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心理较重时,军售较多。

3.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对台军售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双边关系越好,军售越少;双边关系越差,军售越多。

4.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对台军售受到美国政党差异的影响。共和党一般比民主党更倾向于对台军售。

5.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对台军售受到美国府会结构的影响。当国会与总统的政党派别相同时,美国对台军售政策协调一致,军售较少;而当府会政党不同时,一派政党会向另一方发难,对台军售较多。

(二) 变量选择

为了对各个因素进行具体的分析,笔者必须将各个概念操作化为具体指标,下文将分别从因变量和自变量两个层次分析。由于数据所限,笔者分析的时间段为1979—2008年。

1. 因变量

对于美国对台军售的数据,由于本文主要是从美国视角进行分析,因此采用了美国国防部的数据。^①在美国国防部数据中,包括美国对台军售协议额(FMS agreements)和对台军售运交额(FMS deliveries)等。由于美国在签订协议后并不一定立刻将该武器出售给台湾,笔者认为对台军售运交额能更好地反映美台军售的真实情况,因此本文因变量为美国对台军售运交额。

在图1中,笔者以年为单位,画出了每年美国对台军售运交额的变化

^① 数据来源于美国国防部防务安全合作署(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 http://www.dsca.osd.mil/programs/biz-ops/factsbook/Fiscal_Year_Series_2009.pdf。

曲线。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台军售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军售金额保持较低水平；而冷战后则显著增长，1996—2000 年经历了一个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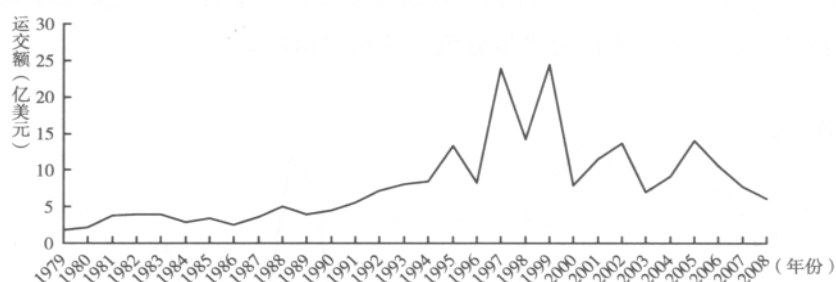


图 1 1979—2008 年美国对台军售运交额历年变化情况

2. 自变量

在研究假设中，笔者认为国际格局、中美关系、中国崛起、政党差别和府会结构都会影响美国对台军售，因此这些变量都是自变量，下面将选择指标衡量这些变量。

(1) 国际格局

对于国际格局，由于中美建交至今国际格局只经历了一次变化，其标志就是 1989 年冷战结束，因此 1979—1989 年为冷战时期，1990—2008 年为冷战后。对于这一分类变量，笔者按照虚拟变量赋值，1979—1989 年赋值为 0，1990—2008 年赋值为 1。^①

(2) 中美关系

对于中美关系 1979—2005 年的双边关系分值，笔者选择阎学通教授

^① 伍德里奇指出“二元的或虚拟自变量在时间序列的应用中也非常有用。既然观测的单位是时间，虚拟变量代表在每个时期中某特定事件是否发生。”“在所谓的事件研究 (event study) 中，虚拟变量是个关键的部分。事件研究的目标是确定某个特定的事件是否会影响到某项结果。”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费剑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12、314 页。本文中冷战结束是个重大事件，因此可以用虚拟变量来表示。

等人的著作《中外关系鉴览 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中的赋值。^① 2006—2009 年的中美关系分值则选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预测组的数据库。由于因变量美国对台军售额的时间单位是年，而中美关系分值的时间单位是月，为了协调一致以方便统计，笔者将中美关系中每年 1 月份的双边关系分值作为当年分值，从而得出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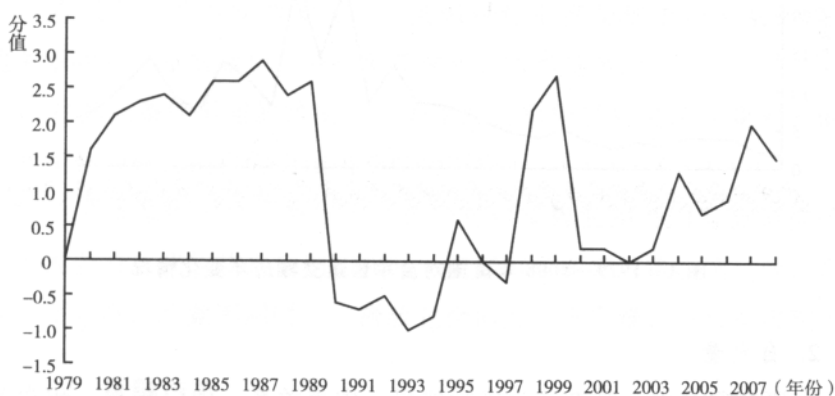


图 2 1979—2008 年中美关系分值

(3) 中国崛起

对于中国崛起，由于其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因此笔者选择的衡量指标是历年美国 GDP 减去中国 GDP 的差值，差值越小，说明中美实力差距越小，亦即中国崛起程度越大。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的数值。^② 本文选择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数值以当期美元 (current US \$) 为单位，其中数据时间为 1979—2008 年。从图 3 我们可以看出，中美的 GDP 差额曲线呈下降趋势。在统计中，一般用 $\ln GDP$ 表示经济发展，因此后文统计中历年美国 GDP 减去中国 GDP 的差值的数学表达式是： $\ln(\text{美国 GDP} - \text{中国 GDP})$ 。

^① 阎学通等《中外关系鉴览 1950—2005：中国与大国关系定量衡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3 页。

^② 参见世界银行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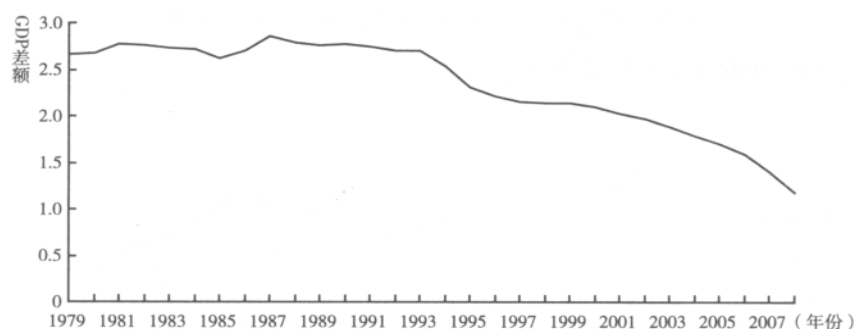


图3 1979—2008年中美GDP差额

然而，中美GDP差额只是体现了美国对绝对获益的关注，而无法衡量出美国对相对获益的重视，为此，笔者在图4中绘出了历年中美GDP排位的差距，我们可以看出，中美的排位差距日益缩小。这种排位差距变小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地位的变化，1980—2008年，美国的GDP一直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而中国则从第11位上升到第3位。因此，中美排位差距能体现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中美相对获益的变化程度。



图4 1979—2008年中美GDP排位之差

此外，中美GDP之差与排位之差都只是中美两国间的数据，并不能反映两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发展差距，因此笔者采用的第三个指标就是GDP占世界总额的比重之差，即美国GDP占当年世界总额的比重减去中

国 GDP 占当年世界总额的比重。根据图 5，我们可以看出，中美 GDP 占世界总额的比重之差在逐渐减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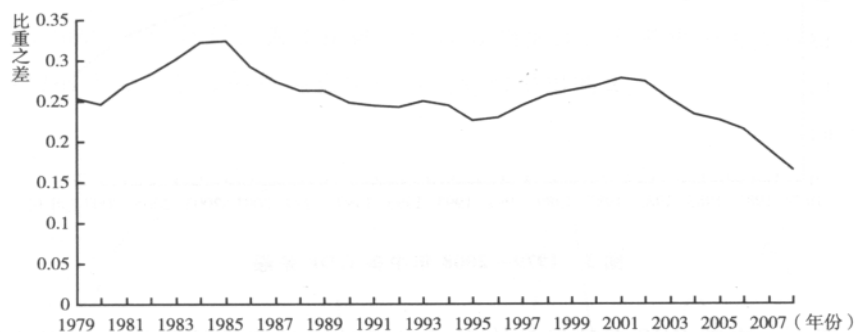


图 5 1979—2008 年中美 GDP 占世界总额的比重之差

(4) 政党差别和府会结构

关于政党差别和府会结构，表 1 列出了 1979—2008 年的美国总统党派、参议院多数党、众议院多数党和府会结构。由于政党类别体现在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三个层面，因此本文将政党差别分为三个变量来处理：总统党派、参议院多数党和众议院多数党。在后文的统计中，这三个层面的政党差别为虚拟变量，民主党赋值为 0，共和党赋值为 1。府会结构则按照总统、参议院、众议院的党派归属划分为三类：三个层面上的党派为同一党派是府会一致的情况。国会多数党不同且总统党派与国会多数党不同的情况是府会弱分立的情况。国会多数党一致而总统党派与国会多数党不同的情况是府会强分立的情况。^① 由于府会结构也是分类变量，因此后文的统计分析中将府会一致赋值为 0，府会弱分立赋值为 1，府会强分立则赋值为 2。

^① 本文有关府会关系区分情况和表 2 中的数据参考了张光、刁大明的《美国国会议员涉华提案初探》一文中“表 2 总统和参众两院多数党的政党归属（1979—2006）”，《国际政治科学》2008 年第 1 期，第 87 页。

表 1 1979—2008 年美国政党差别和府会结构

总统(党派)	时间(年)	国会(届)	参议院多数党	众议院多数党	府会结构
卡特(民主党)	1979—1980	96	民主党	民主党	一致
里根 (共和党)	1981—1982	97	共和党	民主党	弱分立
	1983—1984	98	共和党	民主党	弱分立
	1985—1986	99	共和党	民主党	弱分立
	1987—1988	100	民主党	民主党	强分立
老布什 (共和党)	1989—1990	101	民主党	民主党	强分立
	1991—1992	102	民主党	民主党	强分立
克林顿 (民主党)	1993—1994	103	民主党	民主党	一致
	1995—1996	104	共和党	共和党	强分立
	1997—1998	105	共和党	共和党	强分立
	1999—2000	106	共和党	共和党	强分立
小布什 (共和党)	2001—2002	107	民主党*	共和党	弱分立
	2003—2004	108	共和党	共和党	一致
	2005—2006	109	共和党	共和党	一致
	2007—2008	110	民主党	民主党	强分立

* 在第 107 届美国国会参议院, 部分议员党派属性发生变化, 2001 年 1 月 3—20 日、2001 年 6 月 6 日至 2002 年 11 月 12 日民主党占多数, 2001 年 1 月 20 日至 6 月 6 日、2002 年 11 月 12 日至 2002 年 1 月 3 日共和党占多数。由于民主党占多数的时间长, 本文将此届参议院多数党选为民主党。

三、统计分析

针对上文的数据, 笔者将先进行模型假设, 接着对各变量数据进行相关分析, 然后进行回归分析与协积检验, 最后进行模型解读。

(一) 模型假设

根据前文的假设, 笔者建立了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型。

$$\begin{aligned} \text{年军售运交额} = & c + \alpha_1 \text{中美关系} + \alpha_2 \ln \text{GDP 之差} + \alpha_3 \text{GDP 排位之差} + \\ & \alpha_4 \text{GDP 占世界比重之差} + \alpha_5 \text{国际格局} + \alpha_6 \text{总统党派} + \\ & \alpha_7 \text{参议院多数党} + \alpha_8 \text{众议院多数党} + \alpha_9 \text{府会结构} + \varepsilon \end{aligned}$$

以上模型是静态模型。^①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历年对台军售是时间序列,“时间序列数据有一个关键的特征,使得对它的分析比对横截面数据的分析更为困难。这个特征就是如下事实,即很少(即使能够)假设经济数据的观测独立于时间。多数经济上和其他的时间序列都与其近期历史相关(通常是高度相关)”。^② 因此本文应用 EViews6.0 软件针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分析。

(二) 相关分析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往往要先对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③ 在表 2 中,因变量为年军售运交额。

表 2 美国对台军售金额的相关矩阵

	运交额	国际格局	lnGDP 之差	GDP 排位之差	GDP 比重之差
运交额	1				
国际格局	0.642 ***	1			
lnGDP 之差	0.625 ***	0.862 ***	1		
GDP 排位之差	-0.437 **	-0.554 ***	-0.759 ***	1	
GDP 比重之差	-0.252	-0.612 ***	-0.571 ***	0.452 **	1
中美关系	-0.202	-0.652 ***	-0.310 *	0.029	0.336 *
总统党派	-0.397 **	-0.245	0.013	-0.050	0.135
参议院多数党	0.283	-0.018	0.063	-0.293	0.266
众议院多数党	0.739 ***	0.621 ***	0.678 ***	-0.549 ***	-0.191
府会结构	0.181	0.100	0.118	0.102	-0.082
运交额					
国际格局					

① 伍德里奇指出“‘静态模型’的名称来源于我们构造反映 y 和 z 之间同一时期的关系模型这一事实。当 z 在时间 t 的一个变化被认为对 y 有立即的影响时,通常设定一个静态模型。”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第 301 页。

② 同上书,第 8 页。

③ 易丹辉指出“为了保证线性模型的合理性,首先需要分析因变量和自变量间的相关性,可以通过计算简单相关系数分析。只有与因变量呈高度相关的自变量才适合引入模型。”参见易丹辉《数据分析与 EViews 应用》,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8 页。

续表

	中美关系	总统党派	参议院	众议院党派	府会结构
lnGDP 之差					
GDP 排位之差					
GDP 比重之差					
中美关系	1				
总统党派	0.313	1			
参议院多数党	0.290	-0.094	1		
众议院多数党	-0.227	-0.289	0.491***	1	
府会结构	0.181	0.000	-0.100	-0.030	1

*** 代表 $p < 0.01$; ** 代表 $p < 0.05$; * 代表 $p < 0.1$ 。

根据表 2 的相关矩阵可以看出,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系数角度看,国际格局、中美 GDP 差额(即 lnGDP 之差)、众议院多数党与因变量历年军售运交额的相关系数较高,我们可以猜测这些变量可能对因变量有显著影响。

此外,我们还需要检验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①在表 2 中,lnGDP 之差与国际格局、GDP 排位之差与 lnGDP 之差等自变量的相关系数较高,分别为 0.862、-0.759,且均显著,因此在下文的回归模型中,可能要考虑这两对变量间的干扰。除 lnGDP 之差以外的其他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不太高,没有超过 0.7,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自变量之间可能没有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 回归分析

为了分析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确切关系,笔者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表 3,其中回归参数的估算方法为最小二乘法(OLS),表中每格上行的数字为回归系数,下行括号中的数字为标准差。

^① 高铁梅指出“对于多元情况,古典线性回归模型还要求解释变量之间不相关,即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如果存在某两个解释变量完全相关,即出现完全多重共线性,这时的参数是不可识别的。”参见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EViews 应用及实例》,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8 页。

表3 对军售的回归分析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国际格局	7.816 (5.838)	5.428** (2.590)	6.266** (2.292)
lnGDP 之差	-0.259 (6.240)	—	—
GDP 排位之差	0.1001 (0.568)	—	—
GDP 比重之差	24.041 (30.518)	—	—
中美关系	1.612 (1.204)	1.208 (0.855)	1.430* (0.734)
总统党派	-2.918 (1.939)	-2.841* (1.534)	-2.966* (1.478)
参议院多数党	-0.682 (2.207)	-0.268 (1.784)	—
众议院多数党	4.945 (2.895)	5.260** (2.299)	4.671** (1.804)
府会结构	0.457 (1.006)	0.668 (0.877)	—
常数项	-5.173 (12.736)	2.472 (2.199)	2.680 (1.997)
R ²	0.700	0.689	0.679
调整后的 R ²	0.565	0.606	0.628
F 检验 P 值	0.001	0.000	0.000
D. W. 统计量	3.047	2.977	2.924

*** 代表 $p < 0.01$; ** 代表 $p < 0.05$; * 代表 $p < 0.1$ 。

在表3中， R^2 是样本决定系数，调整后的 R^2 是调整后的样本决定系数，其取值范围为 (0, 1) 区间，一般而言，“ R^2 测度了在 Y 的总变异中由回归模型解释的那个部分所占的比例或百分比。”^① R^2 越接近于 1，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越好。但是 R^2 的值往往会随着自变量数量增多而提高，因此，为了避免自变量数量的干扰，用调整后的 R^2 可以更好地测度拟合效果。F 检验 P 值是相伴概率，其值越接近于 0 的话，说明变量间呈高度线性，回归方程高度显著。“Durbin-Watson 统计量 (D. W. 统计量) 用来检

① 古扎拉蒂 《计量经济学基础》(林少宫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6 页。

验随机误差项是否存在一阶序列相关”^① D. W 值在 0—4 之间, “一般而言, 如果 D. W 值距离 2 较远, 就可认为有一定程度自相关存在”。^②

笔者共分析了三个模型, 其中模型一将所有自变量都纳入了回归方程, R^2 为 0.700, 但是调整后的 R^2 较小, 仅达到 0.565, 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一般。F 检验 P 值为 0.001, 说明模型通过 F 检验。D. W. 统计量为 3.047。但是, 从自变量角度看, 所有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 模型一的效果不太理想。

在模型二中, 笔者删除了与中国崛起有关的三个经济变量, 即 $\ln GDP$ 之差、GDP 排位之差和 GDP 比重之差, 保留了其他自变量。从回归结果看, 模型二的 R^2 为 0.689, 小于模型一, 但是调整后的 R^2 为 0.606, 大于模型一。由于模型二中自变量数量少于模型一,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模型二优于模型一。此外, 模型二的 F 检验 P 值为 0.000, 说明模型通过 F 检验。D. W. 统计量为 2.977, 比模型一好。但是, 模型二的各个自变量中, 中美关系、参议院多数党和府会结构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见, 模型二虽然优于模型一, 但效果仍然不太理想。

在模型三中, 笔者删除了模型二中的不显著的参议院多数党和府会结构, 最后得出模型三。模型三的 R^2 为 0.679, 均小于模型一、模型二, 但是调整后的 R^2 为 0.628, 大于模型一、模型二。在模型三中自变量数量最少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判断模型三优于前两个模型。此外, 模型三的 F 检验 P 值为 0.000, 表明模型三通过了 F 检验, 且 D. W. 统计量为 2.924, 优于模型一与模型二, 我们可以判断模型三的误差项大体不存在自相关。^③ 从自变量角度看, 模型三中的四个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可见其效果比较理想。综合比较三个模型后, 笔者选择了模型三。

① 高铁梅 《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EViews 应用及实例》, 第 71 页。

② 易丹辉 《数据分析与 EViews 应用》, 第 35 页。

③ 根据《D. W. 检验上下界表》, 虽然此处的 D. W. 统计量为 2.924, 但是, 距离 2 有一定的距离, 因而不能确定存在自相关。参见何晓群 《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应用》,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432—433 页。

(四) 变量的协积关系检验

在设定了模型后,由于各个变量是时间序列,为了避免谬误回归^①,首先需要检验其平稳性^②,因为“根据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分析,隐含地假定了所依据的时间序列是平稳的。经典的t检验、F检验等等均以此假定作为依据”。^③其次,对于非平稳序列,若这些非平稳序列存在协积(也称为协整)关系,也可以应用OLS回归。“协积是指尽管两个或多个时间序列个别而论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线性组合则可以是平稳的。……两个(或多个)时间序列的协积(关系)表明它们之间有一种长期或均衡关系。”^④若各变量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但只要我们能证明它们有协积关系,“则我们曾全面考虑过的传统回归方法论(包括t检验和F检验)对涉及(非平稳)时间序列的数据仍可适用”。^⑤

下文将对回归模型各变量的协积关系进行检验。笔者主要采取基于回归残差的ADF检验。^⑥对残差的ADF检验不仅可以判断变量间是否存在协积关系,而且可以判断模型正确与否。^⑦

① 古扎拉蒂认为“一个时间序列变量对另一个或多个时间序列变量做回归,常常会引出无意义的或谬误的结果。这种现象被称为谬误回归,提防它的一个方法是判明这些时间序列是否有协积关系。”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基础》,第780页。

② 伍德里奇指出“实际上,在表述时间序列数据的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时,我们假定了一定形式的平稳性。”伍德里奇《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第335页。

③ 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基础》,第779页。

④ 同上书,第780页。

⑤ 同上书,第773页。

⑥ 高铁梅认为“从协整理论的思想来看,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因变量能被自变量的线性组合所解释,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因变量不能被自变量所解释的部分构成一个残差序列,这个残差序列应该是平稳的。因此,检验一组变量(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等价于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否是一个平稳序列。”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 EViews 应用及实例》,第155页。

⑦ 高铁梅指出“利用ADF的协整检验方法来判断残差序列是否平稳,进而确定回归方程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同时还可以判断模型设定是否正确。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则回归方程的设定是合理的,说明回归方程的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同上书,第156页。

表 4 针对年军售额回归模型残差的单位根检验

			t 统计量	P 值
ADF 统计量			-8.661	0.000
显著性水平	1%	检验临界值	-3.679	
	5%		-2.968	
	10%		-2.623	

表 4 是针对模型三的残差进行 ADF 检验，滞后期为按照软件默认设置为 7，在表 4 中，t 统计量为 -8.661，小于 1% 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且 P 值非常小，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模型三的各变量间存在协积关系，也可以判断模型三是正确的。

(五) 模型解读

根据模型三，关于美国对台军售金额的回归方程为：

$$\text{年军售运交额} = 2.68 + 6.266 \times \text{国际格局} + 1.43 \times \text{中美关系} - 2.966 \times \text{总统党派} + 4.671 \times \text{众议院多数党} + \varepsilon$$

可见，美国对台军售与国际格局有关，国际格局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6.266，这表明，在冷战时期（国际格局赋值为 0），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因此需要中国的合作与支持，在此情况下，美国对台军售比较克制。而在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赋值为 1），苏联已经不再是美国的主要敌人，因此美国对中国的需求不大，在此情况下，美国对台军售数额较大。这证明前文的假设 1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对台军售受到国际格局的影响” 得以成立。

比较奇怪的是，美国对台军售不受中国崛起的影响。在关于衡量中国崛起的三个指标中，中美 GDP 的差额（lnGDP 之差）、中美 GDP 排位之差和中美 GDP 占世界总额比重之差均不显著，这表明前文假设 2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对台军售受到中国崛起的影响” 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其可能的原因是，在中国崛起过程中，美国采取的主要遏制措

施集中在经济领域，例如控制人民币汇率等。而在台湾问题上，由于“台湾独立”倾向加剧，美国没有必要通过对台军售使台湾牵制大陆。相反，由于担心“台独”加剧可能使美国牵扯进战争，美国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台独”的激化。^①

另一个比较出人意料的结果是，尽管中美关系对美国对台军售金额产生影响，与前文的假设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对台军售受到中美关系的影响”相同，但是其影响是正面的，亦即当中美关系改善时，美国对台军售增加，而中美关系恶化时，美国对台军售减少，这与我们原来的假设相反。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是，当中美关系比较好时，美方认为有机可乘，此时军售不会招致中国的强烈反对，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何在奥巴马访华后这一双边关系较好时期美国会宣布对台军售了。

从美国党派对军售的影响看，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哪个党派更偏好军售。从统计结果看，不同层面的政党其立场存在差异。总统的党派归属和众议院多数党归属对美国对台军售都有影响，其回归系数分别为-2.966和4.671，而参议院多数党的归属对军售运交额没有影响。然而总统党派与众议院多数党的影响方向相反，当总统为民主党（赋值为0）时，美国对台军售运交额较多，当总统为共和党（赋值为1）时，美国对台军售运交额较少。而众议院多数党的影响方向相反，当众议院的多数党为民主党（赋值为0）时，美国对台军售较少，而当众议院的多数党为共和党（赋值为1）时，美国对台军售较多。这表明假设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对台军售受到美国政党差异的影响。共和党一般比民主党更倾向于对台军售”部分成立，其中“美国对台军售受到美国政党差异的影响”成立，但是“共和党一般比民主党更倾向于对台军售”则只在众议院多数党层面成立，而在总统党派层面不成立。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众议院议员行为的出

^① 参见 Victor Cha, “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 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3, 2009/10, pp. 158 - 196。在此文中，作者认为美国在东亚安全结构中采用双边主义是因为“权力玩家”（powerplay）策略，即在一种不对称同盟架构中控制小盟友的行为。为了防止自己被迫陷入不想参与的战争，美国会严密控制台湾。

发点主要是所属政党利益，而总统则要全盘考虑国家整体利益。

最后，美国国内的府会结构对美国对台军售金额没有影响，这表明前文的假设5“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对台军售受到美国府会结构的影响”不太正确，不论美国国内的府会是一致还是分立，美国在对台军售时，府会结构不发挥影响。笔者认为，这与我们上文对政党影响的结论有关。由于府会结构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政党冲突，而政党的影响在不同层次上不同，因此府会结构也相应无法产生影响。

四、美国对台军售的影响因素

根据回归模型，我们可以修正前文的五个假设，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美国对台军售金额受到国际格局的影响，冷战后的军售运交额远远多于冷战时期。第二，中国的经济崛起不影响美国对台军售的金额。第三，中美关系对美国对台军售产生正面影响，即双边关系好时，军售运交额反而较多。第四，美国对台军售受到了党派政治的影响，总统党派为民主党时，美国对台军售更多。而当众议院多数党为民主党时，美国对台军售更少。第五，美国的府会结构不影响美国对台军售。

（一）美国对台军售的根源是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①

如果我们脱离国际环境背景而考虑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就会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境地。正是日益尖锐的中美结构性矛盾导致美国对台军售愈演愈烈。所谓结构性矛盾，是指在特定国际格局下，两国地位变化导致的矛盾，远如一战前的英德，近如二战刚结束时的美苏。在这种结构性矛盾下，不管决策层如何改善双边关系，仍然无法避免两国的防范心理日益加重的结局，而目前的中美两国恰恰陷入这种矛

^① 本文采用结构性矛盾的说法，是借鉴了阎学通教授的说法。参见阎学通《未来10年：中国安全环境的变化趋势——台湾问题、中美结构性矛盾和经济全球化的负作用将成为中国战略安全主要威胁》，《国际展望》2000年第19期。

盾之中。美国学者江忆恩甚至撰文指出，中美关系处于安全困境之中。^① 冷战结束后，中美联合对付苏联的局面一去不返，美国作为当今唯一的霸主，其核心战略是避免新的挑战者出现。在中美结构性矛盾下，美国对台军售日益发展。

从建交迄今的数据看，美国对台军售并不受中国崛起的影响。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首先，中国的崛起主要是经济上的，因此美国倾向于通过控制人民币汇率等方法遏制中国。其次，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崛起的同时，台湾的“独立”意识也愈益强烈，台湾问题已经极大程度上牵制了大陆的精力。例如，马英九 2011 年 4 月说“中国大陆‘仍是台湾国防上最大的威胁’，所以建军备战上连 1 秒都不能松懈。”^② 在此背景下，若美国加大对台军售力度，反而可能鼓励“台独”，甚至可能使美国被牵涉进地区冲突。1995 年与 1996 年台海危机后，中美双方彼此清楚了对方的底线，美国明白中国将不惜任何代价阻止“台独”，而中国也明白一旦动武美国必然会介入。^③ 因此我们根据图 1 可以看到，美国在进入 21 世纪以后，对台军售运交额还不如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的水平。这样美国既可以牵制中国，又不会严重到导致两国兵戎相见的程度。^④ 当然，这一结论是建立在以往 30 年数据基础上的，如果未来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性质判断发生变化，例如，认为中国是政治军事崛起，则美国可能会加大军售额度。

(二) 美国对台军售受到美国国内党派政治的约束

如果说中美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美国对台军售的趋势，那么美国国内

① Alastair Iain Johnston, “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 in Sino-US Relations: A Response to Yan Xuetong’s Superficial Friendship Theor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4, No. 1, 2011, pp. 5 – 29.

② 《马英九：大陆仍然是台湾最大威胁 备战不能松懈》，《环球时报》2011 年 4 月 7 日。

③ Robert S. Ross, “The 1995 – 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Coercion, Credibility, and the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2000, pp. 87 – 123.

④ 参见 Phillip C. Saunders and Scott L. Kastner,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Envisioning a China-Taiwan Peace Agree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4, 2009, pp. 87 – 114. 作者指出，台海局势缓和对美国来说是有利的，所以美国应支持大陆与台湾和谈，以缓和两岸关系。

的党派因素则起了调控军售的约束作用。

关于党派政治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党派政治确实发生影响，不同党派的意见存在重大差异。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判断民主党或共和党哪一方更关注售台武器事宜，因为在民主党为多数党时，共和党作为反对党可能在军售问题上发起挑衅，反之亦然。因此，我们在研究美国国会和总统的党派轮替时，仅仅讨论党派的不同偏好恐怕于事无补，而是需要进一步分析不同党派执政情况下的军售变化情况。

其次，党派政治的影响受到不同机构的制约。总统是美国最高元首，因此其决策往往从国家利益出发，也更容易觉察到中美间的结构性矛盾。而国会特别是众议院则更为关注民意，简言之，众议院可能会通过打中国牌来获得支持，因此众议院层面的党派争斗容易使美国对台军售额度发生重大变化。

（三）改善中美关系难以减少美国对台军售

双边关系体现了决策者的主动性。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在双边关系出现僵局时，领导人或通信，或访问，从而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景象。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和尼克松接踵访华即为成功案例。然而，双边关系不仅仅是两国间的关系，作为在国际舞台活动的两个大国，中美关系不可能不受国际格局和实力对比的影响，因此领导人改善双边关系的作用具有一定的限度。我们可以猜测，如果不是冷战时期苏攻美守的情势，基辛格恐怕未必访华。

根据前文分析，美国对台军售深受中美结构性矛盾的影响，而中美关系尽管对美国对台军售运交额具有影响，但是其影响是正面的，即美国可能会乘双边关系较好时，加大对台军售的力度。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国人认为亲华的老布什总统时期，时值冷战结束，美国批准了历史上额度最大的一笔对台军售——于1993年1月宣布对台出售武器金额达到100亿美元。在中美结构性矛盾下，中美关系在实质上并不是战略伙伴，而是“假朋友”关系，双边关系水平远远不如20世纪80年代中

期的水平。^① 然而,两国领导人并没有正视这一矛盾,而是试图通过模糊战略创造友好的契机,因此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小布什政府提出了“战略竞争者”和“利益攸关方”关系。但是,双边关系的人为改善不能扭转美国对台军售的变化趋势。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美国认为中国会在军售问题上妥协,进而大量军售。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模糊战略使美国误以为在双方利益冲突时我会作出更多的妥协,这就提高了美方的期望值。”^② 因此出现了奥巴马访华后美国宣布售台武器的矛盾现象。

五、结语

台湾问题是关系我国统一的主权问题,然而美国对台售武,既恶化了两岸关系,也不利于祖国统一。透过纷纭变幻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售台武器的本质。在冷战后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美结构性矛盾成了横亘于中美两国之间的主要障碍,也是美国对台军售的原动力。这种结构性矛盾是双方决策者力所不及之处,因此即使中美关系改善,也难以使美国减少对台军售。由于中美结构性矛盾在未来十多年仍会存在,因此我们可以预测美国对台军售仍会继续甚至加剧。若要破解这一问题,则需要破解结构性矛盾,或者出现中美的共同敌人,或者使美国感受不到中国崛起的威胁。管子有言“安危在乎同利。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③ 如何化解矛盾,实现与天下同利,顺利解决美国军售和台湾问题,则需要决策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① Yan Xuetong, “The Instability of China-US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3, 2010.

^② 阎学通 《中美是“敌大于友”的关系》。

^③ 管仲 《管子·版法解》。

作者简介

钟臻 香港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

电子信箱: cookiechung@163.com

吴文兵 贵州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2011年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

电子信箱: wuwenbingthu@sina.com

漆海霞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讲师。2007年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oceanqi@126.com

徐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2006年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国际安全、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以及战争法。

电子信箱: xuj@cass.org.cn

唐世平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1995年在美国韦恩州立大学 (Wayne State University) 获分子生物及遗传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理论、社会科学哲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等。

电子信箱: twukong@yahoo.com

王明国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讲师。2012年在复旦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wmg7971@sina.com

李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2009年在复旦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2009—2011年在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金融改革。

电子信箱: kindyleeway@gmail.com